

张宏生 著

江湖诗派研究

程千帆署



江湖诗派研究

张 宏 生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诗派研究/张宏生著.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ISBN 7-101-01149-7/I · 196

I. 江…

II. 张…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南宋(1127~1279)-学位论文
文②文学研究-诗歌-中国-南宋(1127~1279)-学位论文

IV. I207. 22

责任编辑: 徐 俊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张 宏 生 著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13 5/8印张·326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定价:18.65元

序

傅璇琮

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原是张宏生同志的一九八九年博士毕业论文。论文答辩的时间原定于六月初,在此之前我受程千帆、周勋初先生的邀约,作为论文答辩委员,阅读了正文的大部分章节。但说也奇怪,那时虽然也安下心来读了,但却如四灵之一的赵师秀诗中所说,“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我当然不在智者之列,但却也昏昏,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读后感,竟茫茫一片。时隔数年,这部论文现在作为专著,在我工作的中华书局出版,我这次确实是静下心来通读了全部校样,竟如同读一部从未寓目的新书一般,感到既陌生而又亲切,并惊异于论文作者在几年之前对文学史的理解竟已至如此成熟的程度。

我之所谓对文学史的理解至如此成熟的程度,是近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要对于“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须“完全明了”,这样“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先生这里说的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态度,我觉得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应有此种“通识”。

对江湖诗派,自宋元之际的方回起,至清朝官修的《四库提要》,及一些诗评家(如李调元《雨村诗话》),无不以尖刻的词句,加以讥刺甚至辱骂,什么“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江湖末流寒酸

纤琐”，“江湖一派以纤佻为雅秀”，“油腔腐语，编凑成集”，等等。古人的这些评论，似乎还影响到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这些评语，其语气似颇为尖锐，实则仍不免失之于隔阂肤廓。

本书却不然，对于环绕江湖诗派的种种问题，均力持客观分析的态度。作者对江湖诗派的研究，有一个总原则，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南宋中后期出现的江湖诗派，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研究江湖诗派，也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范围中去考察”（页323）。这就是说，对江湖派诗人在南宋中后期所表现出的特殊生活方式，这一诗歌流派的特殊风格，都应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去加以体认，这就有可能超越于某些传统观念的个人感情好恶，使人们可以真正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同上陈寅恪语）。

如江湖诗人的所谓谒客身份，书中不仅在正文中专辟一章，即第二章《文化传统的倾斜》，作专门的论述，还在附录中以大量材料，分类考析行谒的内容和方式，谒客阶层的形成，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当世显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不知他人读后感觉如何，我个人是，学句时髦话，是读得非常过瘾的。从来还没有把江湖诗人的谒客身份如此详细地讨论过。行谒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乞钱，但为什么到南宋中后期在诗人中竟形成如此一个群体，以致可以说是一个阶层，这之中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行谒对当时的诗人心理产生哪些失衡，他们又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使之平衡？书中都有不少有趣的描述。由此，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同意作者这样的结论：“由于江湖谒客的出现是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身上所反映的诸特点，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代、尤其是对南宋社会的理解”（页350），“以往学者研究宋代知识分子，往往只注意了其正面形象，而经常

忽略那些与宋代正统的文化精神相悖的部分。我们的探索便是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以期加强对宋代知识分子的全面理解”(页42)。

当然,江湖派毕竟是一个诗歌流派,我们的研究最终还应落实到文学的分析上。书中并未忽略这一点,而是着重在这方面化了力气。书中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就主题取向、审美情趣、时空与意象、诗歌渊源,以及代表诗人的作品评介,作了极为全面的称得上是美学的考察。我说是美学的考察,是说书中对作品的分析并不停留在一般的词句鉴赏上,而是对作品如何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作既细腻又宏观的深切体认和整体把握。是一种与读者的诗情交流与理性共识。如过去一直以为江湖诗人只追求纤巧,被人讥议为琐屑甚至卑下。确实,江湖派诗人的境界是有狭窄的弊病,但正如作者所说,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仅作简单的价值评判。书中论这些诗人由于在艺术追求中往往把眼光投入琐碎的生活片断,视野不免局促,就使整体上缺乏超越性,但从具体艺术美感来说,这种追求仍有其不可代替的魅力,由于形象更加直观,感觉更加细腻,就从而在常见的物象中,进一步挖掘出清新自然之美。书中又论到,江湖诗人到处游谒,不遑宁居,因此对于时间的流逝,往往别有一种敏感。书中第三章《羁旅之苦》一节,写到这些诗人由于经常处于羁旅漂泊之中,因此最为刺激他们心灵的,莫过于清晨和深夜。书中指出这一点,并由此而展示江湖派诗人独有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取向,论述颇富新鲜感,足以见出作者艺术触觉之细致与敏锐。

根据书中所考,可以列为江湖派诗人的,有一百三十八个。当然,具体哪些诗人是否真正属于这一诗派,还可讨论,但不可否认,这么多诗人组成一个流派,而前后活动期又在半个世纪以上,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即使算不上绝无仅有,也是极为少见的。过去的一些论著,往往说他们只管个人琐细的眼前利益,而不关心国家

大事，实际上评论者没有看到当时的国家所给予这些诗人的是怎样一种重压，江湖派诗人的心灵创伤不仅来自于生活贫困所受到的世人的白眼，而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这一时代和社会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本书作者认为江湖诗派的形成当以嘉定二年(1209)划线，这年陆游去世，《江湖集》编印面世。此说是言之成理的。而可以注意的是，在此以后，正是南宋军事、政治、经济全面恶化直至最后崩溃的时期。开禧二年(1206)伐金失败，标志南宋政权直线走向衰亡。嘉定元年(1208)三月宋金和议，宋朝廷承受了改金宋叔侄为伯侄的屈辱，而且大量增加给金朝的岁币，使得本来就十分严峻的财政危机更加速发展。嘉定和议签订仅六年，宋金又发生秦州之战，又四年，金南侵，宋下诏伐金，此后一直到金为蒙古所灭，宋金战争不止。绍定三年(1230)，蒙古军攻破南宋剑外和州，四年，攻破四川的兴元及沔州。绍定六年，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金亡后，强大的蒙古国即成为南宋的直接威胁力量。不久，蒙军攻入四川，端平二年(1235)，蒙军又举兵南下，攻破唐州、信阳、第二年，入襄阳。淳祐元年(1241)，蒙军占领四川大部。蒙古国的铁骑步步进逼，在军事上完全掌握主动，南宋只是一个等待被吞食的弱兽。可以想见，这样的一种恶劣形势，持续半个世纪，对人们，特别是对下层士人，会造成怎样一种忧郁压抑而又惊惶不定的心理。

大量军费开支，以及战争的直接破坏，使南宋社会矛盾更加严重。吴潜在端平年间曾上疏：“开禧、嘉定，相继用兵，州郡所畜，扫地殆尽。”(《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徐鹿卿于淳祐中(1241—1252)赴任建康，历述所走过的南康、池阳、太平等地，“流离殍死，气象萧然”(《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拨采本账济饥民札子》)。嘉熙、淳祐间，杜范上疏，说东南一带，已是十室九空，“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离，襁负相

属，欲归无所，奄奄待尽”（《宋史》卷四〇七杜范本传）。老百姓处于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宋朝廷仍横征暴敛，江湖派的代表诗人刘克庄，在他担任官职时曾说：“夫财用窘迫，乃今世通患；居官者苟可取盈，无所不至。”（《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九《乞免循梅惠州卖盐申省状》）应该说，刘克庄是一个尽职的官吏，他在居官之日，曾多次为当时的财政困窘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文集卷五一《备对札子》建议“罢编户和籴之扰”，以为是“裕国宽民之要方”。在这一札子中，他又激烈地指责“颍闽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又说：“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当然，他针对此而提出的“追大吏乾没之赃”的措施，也与上面的“罢编户和籴之扰”同样，根本未能行通。

我在这里举刘克庄的例子，是想说明江湖派诗人并非天生不关心政治，相反，他们中有好几位，在居一定官位时对朝政的腐败是慷慨陈辞，而处于平民百姓时也曲折地表达对世事的忧虑和愤慨。但政治迫害（如江湖诗祸）和社会黑暗使他们对现状起一种冷漠感。这使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他说梁氏死后，“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实则这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极丑怪之奇观，而梁氏“少为儒家之学”，“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因此不免对政治总要介入其间，故虽“高文博学”，而终不能安心于学问。最后寅恪先生深致感喟：“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我觉得，造成江湖派诗人对世事之冷漠，也正是这一时代、社会之不幸，而不能苛求于诗人本身。关于这一点，书中也有较好的阐述，我只就平日读书所及，略作些许补充。

我还想说的是，张宏生同志在《后记》中特别提到导师程千帆

先生治学对他的启发,说:“程千帆教授的治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研究问题时,往往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来,尤其注重作品本身的体验。”关于千帆先生的治学成就,周勋初先生在《〈古诗考索〉读后记》中已有很好的阐述,我这次重读勋初先生这篇文章,又读了千帆先生的《闲堂自述》,对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思路有进一步的体会。

一九八三年,我与程先生一起在桂林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基金资助评议会,就在那次会议上,程先生提出他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计划,我即从心底里钦佩程先生的识见与魄力。程先生很早就提出“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的治学路数,而“唐宋诗歌流派研究”正是这一治学思路的进一步发展 with 具体落实。莫砺锋同志的《江西诗派研究》,蒋寅同志的《大历诗风》,和张宏生同志的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在千帆先生的指导下,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正是很好地体现了《闲堂自述》中的学术概括:“在诗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我宁可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宁可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而不是反过来。在历史学和文艺学这些基本手段之外,我争取广泛使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假如它们有助于使我的结论更为完整和正确的话。”

我有一种感觉,千帆先生提出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以及莫、蒋、张三君体现了千帆先生治学思路的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程先生在三十年代曾受到南京几位国学

大师的教益，“厚德载物”，他的学问基础的深厚即来自渊远流长的传统。而程先生在此后又逐步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恰切地运用了中外关于研治人文科学的新理论，这样他就在传统的治学路数上融汇入现代科学的成果。特别是他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直至现在，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结合的治学思路已较原来的考证与批评结合更富时代性，在学术层次上更有所发展。这不但体现在程先生近十余年来问世的几部专著上，也表现在他与励初先生一起，陆续培养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学研究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严谨中创新的极有生气的学风。我由此又想起王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去清华大学学派时的一段话，他说：“清华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或‘疑’，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和海派之长，做到微观和宏观的结合。”清华的这一学风，是由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学者的长期积累而逐步形成的，这已是我国现代学术思想上一项极可珍贵的财富。不知怎么，在想到这些时，联系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我就不禁联想起程千帆先生，想起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与治学经验。薪传不息，我们民族的学术发展必将应上古代学人的一句名言：日新之谓盛德。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日，甲戌岁旦

于北京六里桥寓所

目 次

序	傅璇琮 1
导言	1
第一章 江湖诗派的形成	8
一、社会因素	8
二、文学因素	11
三、个人因素	20
(一)陈起的组织作用	20
(二)刘克庄的领袖作用	24
第二章 文化传统的倾斜	33
——江湖谒客的生活形态及其他	
一、问题的提出	33
二、非官非隐阶层的出现	33
三、诗的地位的变化	37
四、行谒的价值落差	39
第三章 主题取向	44
一、忧国忧民之怀	44
二、行谒江湖之悲	58
三、羁旅之苦	61
四、友谊之求	76
第四章 审美情趣	88

一、纤巧之美	88
二、真率之情	97
三、俗的风貌	105
四、清的趣味	124
第五章 时空与意象	140
一、时空形态	140
二、意象结构	151
第六章 诗歌渊源	172
——关于江湖诗派学晚唐的若干问题	
一、“晚唐”的时间界定	172
二、“晚唐体”的范围	175
三、许浑的意义	177
四、对晚唐体的价值体认	180
五、江湖诗派学习晚唐的目的	184
第七章 江湖诗品	192
一、论刘过诗	192
二、论姜夔诗	206
三、论戴复古诗	221
四、论刘克庄诗	240
五、论方岳诗	256
附录一 江湖诗派成员考	271
一、传世各种江湖诗集中诗人总数之统计	271
二、江湖诗派成员考	296
三、不属江湖诗派之人员考略	313
四、总结	317
附录二 南宋江湖谒客考论	323

一、问题的提出	323
二、行谒的内容和方式	324
三、谒客阶层的形成	329
四、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	341
五、当世显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	347
六、江湖谒客的认识意义	350
附录三 江湖诗祸考	358
一、诗祸发生的时间	359
二、诗祸发生的原因	361
三、诗祸所涉及的人员	363
四、诗祸的后果及其影响	365
附录四 《江湖集》编者陈起交游考	371
主要征引书目	399
后记	416

导 言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灿烂辉煌的全盛期。唐代诗人以其伟大的天才和旺盛的创造力,将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①唐诗的杰出成就和丰厚遗产,对于紧承其后的宋代诗人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然而,面对这座高峰,有志于再辟诗国疆域的宋代诗人既没有望而却步,也没有亦步亦趋。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诗歌创作的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有所发展,从而使宋诗在文学史上成为与唐诗并峙的另一座高峰,使得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又一次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宋诗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现了许多诗歌流派。

按照现行的文学理论,流派的形成至少应具备四个条件:1. 有着明确的文学主张;2. 有着公认的领袖;3. 在这个领袖周围有一个创作群体;4. 这个群体有着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风格。如果严格地用这些标准去衡量,则中国明代以前的许多所谓流派大都不能成立。事实上,中国古代关于流派的概念,往往并不是如此严格的。从创作实际来看,体(风格)与派在古代批评家的笔下经常被等同起来,作为同义词使用。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大历体”、“元和体”等与“江西宗派体”并称、并置,便是一例。但是,风格与流派毕竟不是一回事。体、派并称,只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随着文学意识的加强,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向规范化发展。从唐到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发展的轨迹。宋诗则正处于这一发展的过渡阶段。

关于宋诗的流派,文学史上有过多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

似乎是梁崑在《宋诗派别论》中所提出的十一派说，即香山派、晚唐派、西昆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晚宋派。这种划分，虽然大体上符合宋诗创作的实际情况，但所根据的标准却不够统一，尤其是未将体与派区别开来，如所谓“香山派”、“晚唐派”等，不过是某种风格的概念而已。不过，尽管如此，宋诗中的体事实上已带有了派的特征，因为，它往往意味着一定的文学主张的提出，因而与派是相通的。而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内涵的体的不断出现，使得宋代形成了比较正规的诗歌流派，如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我们在此不妨将其与唐诗流派作一比较。

一般说来，直到中唐以后，唐诗才出现了百花齐放、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派约有四个：一是以韩、孟为代表的奇险诗派；二是以元、白为代表的通俗诗派；三是以韦、柳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四是以姚、贾为代表的苦吟诗派。但是，这些所谓诗派的概念，都不过是后人归纳的产物，在当时，无论是上举诸代表人物，还是其诗风的追随者，都几乎没有开宗立派的明确意识。这些诗派的形成，实质上是这些有声望、有吸引力的作家以其富有独创性的创作，受到一批同时或后来诗人的仿效，因而出现的某种诗歌风尚。无疑地，中国的诗歌流派是滥觞于这种方式的，而且，在后世尤其是宋代的诗歌流派中，我们也能不时地看到其影响。但是，文学毕竟在不断发展；文学观念、文学意识、文学的自觉程度，也都在不断演进。由不自觉状态进入自觉状态，在文学发展中乃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宋代诗派与唐代诗派间的重要区别。宋代诗派之异于唐，简言之，约有三点：第一，推举了诗派领袖，如江西诗派之于黄庭坚，江湖诗派之于刘克庄；第二，提出了明确的诗歌主张，如西昆派效义山诗风，江西派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第三，有着强烈的变革诗风的意识，如江西派之于西昆派，江湖派之于江西派。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事实

上,并非每一宋代诗派都具备这些因素,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出来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又显示了宋代诗派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宋代诗歌流派中,江湖诗派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流派。②

这个流派大约兴起于十三世纪初叶。当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微,代表着南宋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相继谢世。一向热闹的诗坛,开始寂寞起来。最早打破这种寂寞的是四灵:徐照、徐玠、翁卷、赵师秀。这四位永嘉诗人,在大儒叶适的揄扬、鼓励下,提倡姚、贾,反对江西,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四灵的创作,受到了同时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重和效法,推动了江湖诗风的形成和发展。宝庆元年(1225),钱塘书肆陈起把以同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体的一些诗作汇集起来,刻成《江湖集》,客观上总结了宝庆前江湖诗歌的创作成果。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了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笼罩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

由于陈起初刻《江湖集》已经散佚,关于江湖诗派的最后构成,我们现已不能确切得知。值得庆幸的是,后世的许多学者、藏书家为了恢复江湖诗集的原貌,曾进行了广泛的搜求。现已知道的,便有十几种江湖诗集行于世。这些集子,连同当时一些笔记、诗话、书目中的记载,就都成为我们确定江湖诗派成员的原始依据。但是,由于所见不同,取舍标准不同,这些江湖诗集的收录情况比较

芜杂,需要进行一定的清理爬梳。为此,我初步拟定了作为一位江湖诗人的五条标准:1. 社会地位较低;2. 主要活动时间在嘉定二年(1209)以后;3. 作品为所有或大部分江湖诗集所收录;4. 与陈起有唱酬;5. 历史上具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样,会同其他途径所得,共确定了138位江湖诗派成员。这样多的人数和这样大的规模,在宋代诗歌流派中应该是独一无二的。③

这样一大批江湖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他们的身份多为布衣、清客,有些人后来虽曾入仕,但官做得也并不大。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漫游江湖,行谒权门,干私书,求俸余,靠写诗来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④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是较早的一支以写诗为职业的队伍,尽管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人职业化和艺术商品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尽管他们生长在一个日趋腐朽的社会中,并且自身也有不少弱点,却并非没有政治热情。对国事的忧虑和对农民的怜悯,是他们诗中的重要政治内涵。而且,由于他们对政治有着一定的参与意识,曾遭到统治集团的嫉恨,因而构成江湖诗祸,受到诬陷和打击,不少人被卷入这一继“乌台诗案”后的宋代第二次较严重的文字狱中。⑤不过,江湖诗人毕竟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阶层,社会的腐败状况和他们自身的生活形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政治社会进行非常富有实质性的关切,因此,他们诗中所反映的,多是身边的生活琐事,个人的喜怒哀乐,这些,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真实的心路历程。

在诗歌艺术上,江湖诗派虽然比较缺少独创性,但他们的作品仍能反映出这个阶层的特定风貌。他们的诗,追求纤巧之美,重视真率之情。或文风近俗,或句意求清,有着比较丰富的审美内涵。此外,在诗歌的时空、意象等方面,他们也都有着自己的追求和喜